

容闳与洋务运动

袁鸿林

一、引言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①广东香山人，著有英文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涯》^②等。容闳享年八十四（1828—1912）年，几乎经历了整个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他一生活活动众多，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它们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从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八一年，容闳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几达二十年之久，颇有一番作为和主张，成为这个时期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因此，研究容闳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活动、主张以及他与洋务派的关系，不仅对研究容闳来说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对于洋务运动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二、洋务运动前的容闳

在论述洋务运动时期的容闳之前，有必要先将他在此之前的主

①《容氏谱牒》卷十五。其号又作“纯父、纯圃、淳甫、菀浦、春浦、纯斋”等。

②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R, 1909。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了徐凤石、恽铁樵的中文译本，名《西学东渐记》，但漏误甚多，故本文引文除特别注出外，均据英文原版，略作“容自传”。参见拙文《关于〔西学东渐记〕》，《书林》1981年第6期。

要情况略作论述。

容闳出身于一个普通贫寒的农家。一八三五年，被父亲送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办的教会学校，在该校肄业三年多。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他又入玛礼逊教会学校，一八四六年底毕业。次年，他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先后在麻萨诸塞州的芒森学校和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得文学士学位（1876年耶鲁大学又授于他法学博士学位）。容闳是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国人。

由于长期、系统的西方教育，容闳广泛学习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西方文化，并亲身接触了西方社会、目睹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了解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制度，从而形成了西化的性格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当他回头面对中国现实时，便深感祖国的落后和危机：国家和民族处于被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地位、经济和科技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没落。同时他也深感自己负有救国救民的责任。他在整个大学时期，特别是最末一年，经常自问：“我将如何来利用我所获得的知识呢？”①在一八五二年底致卫三畏的信中他已表露了这样的思想，并与选择将来的职业一事联系起来，他说：“如果住到一八五四年夏，我将获得文学士学位，此后我将考虑回国并且仔细考虑将来的职业。谈到职业，我还没有一定的结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将来要学习农业化学。我也许去学习内科和外科医学。有那么多东西——而且每一种都对想为祖国谋福利的人那样地具有价值，以致要想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种是实在太困难了。”②

他始终没有选定上述的某一行职业，这显然是因为意识到独自

①容自传，第40—41页。

②《1852年12月30日容闳致卫三畏函》（英文未刊手稿，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一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把眼光从自己转向整个社会。因此,容闳后来始终致力于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成了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为了改革中国、使中国通过近代化而富强起来,他象大多数改革派思想家一样,首先考虑的是造就一批从事改革和近代化的人材。当时他认为,使中国的青年一代获得西方的先进教育是至为重要的,他在自传中说:“在大学最末一年结束前,我对以后的事业已规划了草图。我确信中国的新一代也应当享受我所受过的教育利益;通过西方的教育使中国得以维新,文明强大起来。”^①他的美国老友特韦契尔也说,容闳当时曾与美国同学讨论过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生计划。^②

一八五五年,容闳放弃了在美国谋求优越地位的机会,满怀着维新祖国的抱负回到了祖国。可是,在归国后的最初五年中,严酷的现实不仅使他无以实现自己的救国计划,而且奔波五载,屡迁其业,所遇所见,尽是难以言状的黑暗和污秽,思想深受刺激,于是,他抱着对太平天国同情的态度和试图通过太平天国来推行其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的期望,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次日,他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改革建议:“一、按科学制度组织军队;二、建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能力的军官;三、为海军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四、组织一个民政政府,由富有才干和经验的人在各行政部门充当顾问;五、建立银行体系,制定度量衡标准;六、建立面向民众的年级制学校教育制度。采用《圣经》为课本之一;七、建立一系列实业学校。”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政府愿意采纳这些措施,拨出适当款项,予以实施,我十分乐意为帮助贯彻这些措施而效力。”^③通过实地考

①容自传,第41页。

②容闳:《西学东渐记·代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6页。

③容自传,第109、110页。

察，容闳觉得洪仁玕当时“孤立无援”而“根据领导人的行为、品格和政策来判断，对于他们能否取得最后胜利，我十分怀疑”，①看出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暮气日深的情形。于是，他终于谢绝了洪仁玕的挽留，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容闳的天京之行对太平天国并无实际影响，但是他的七策则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维新方案，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意义和地位，这七条建议虽侧重文化教育，但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是一个以模仿西方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方案。它企图将太平天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如果太平天国能在全国获得胜利，那么还企图将整个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为提高中国全体福利或我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促进教育上和政治上的改革计划”。②这个计划有如下的改革内容：在政治上，提出组织一个“民政政府”，所谓“民政政府”，即指一种君主立宪政府。在经济上，想通过创办银行、制定度量衡标准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军事上；想用模仿西方创办军事学校的方法，使太平天国培养出一批军事素质较好的军官，从而建立起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开办军校，这在容闳心目中无疑是国防近代化的步骤之一。在文化教育上，提出民众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年级制教育这些近代西方的先进教育制度，想通过这些教育来提高民族文化和培养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近代国防、科技人材。显然，容闳在天京提出七条改革建议时，他的爱国维新思想已基本形成，这在时间上，早于王韬等早期维新派，因此，他不愧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最早倡导者。容闳后来便是以早期维新派的面目参与洋务运动的。

①容自传，第109、110页。

②容自传，第123页。

三、容闳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活动和主张

容闳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活动和主张，可归纳为如下十个方面：

一、提出工业近代化的初步方案和赴美购买机器。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容闳在安庆曾国藩的军营得知曾想办一个兵工厂后，随即向曾提出了一个变单纯兵工厂为“能制造专门机器”的“普遍基础性的机器母厂”计划。容闳设想由这个机器母厂派生出很多机器厂，以奠定机器制造业的基础。这个机器厂不仅生产枪炮，而且也利用“中国比欧美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生产民用商品以抵制外国商品的输入，①这无疑代表了正在破土而出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要求的“商战思想”，也是中国最早的工业近代化的初步建设蓝图。为实施这个计划，容闳接受了曾的委派，于一八六四年初赴美购买机器。购买机器的款项分别从上海和广州提取，据容闳的说法，共领得银68,000两。②但从曾国藩的信札看，容闳从上海李鸿章处得库平银一万两，从广州毛鸿宾处得库平银二万两，总数为三万两库平银。③一八六五年九月，容闳回到上海，运回了在美国定制的各类机器“一百数十余种，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④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较有规模地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

二、提出在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的设想。在容闳看来，引

①容自传，第168—169、154页。

②容自传，第168—169、154页。

③曾国藩：《致毛寄云制军》和《致李少荃中丞》（同治二年十月廿四日），《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87—189页。鉴于容闳的自传经常有错，我认为曾国藩信中的数字较为可信。

④《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曾文正公全集》（下略作《曾集》）卷二十五。

进外国先进设备的同时，必须引进相应的科学技术。一八六七年，曾国藩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即乘机向曾提出在江南制造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计划“在这个学校里，中国青年得以受到机械工程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教育，这样使中国能及时免于雇佣外国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而能完全独立自主。”这里容闳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和教育为独立自主方针服务的先进思想，并明确意识到，他的主张是“立即想使中国人的思想有一个实际转变”，①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君子不器”而鄙视各种“奇技淫巧”。

三、译书。丁日昌当两淮盐运使期间，容闳曾随至扬州。一八六五年十一月至一八六六年四、五月，容闳曾在那里从事翻译，译了美国人哥尔顿（Walter Colton, 1797—1851年）的一本游记和美国法学家派森（Theophilus Parsons, 1797—1882）的《契约法》的大部分。②这反映了容闳曾有过介绍西方人文知识和社会学说的启蒙意图。

四、提出中国商人的第一个轮船公司方案。一八六七年春夏间，容闳在上海发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并正式拟定了章程，经上海道应宝时和两江总督曾国藩转呈至总理衙门。容闳的这个章程体现了新兴资产者的要求，其序说：“……同治五年春夏间，宝顺、琼记所载往汉口之轮船，俱为旗昌一家所得，自此垄断独登、操纵由己，……不诚于我中国商人大有窒碍乎？……今议设一新轮船公司，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倘能办成则于“中国商货大有便益”。③此轮船公司系一纯粹民营的企业，它在集股、管理、分润

①容自传，第168—169页。

②容自传只说“哥尔顿的地理学”和“派森的契约论”，未标出作者和书的全名。此据百瀨弘先生的说法，见百瀨弘译注、坂野正高解说：《西学东渐记》第155—156页。

③容闳：《拟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72—875页。

等方面基本仿效西方企业的方式，其理想是以自由竞争的精神发展轮运业，并促进商业，打破外国洋行的垄断局面。次年，容闳还通过了丁日昌转呈总署一个条陈，提出由此公司承担漕运。^①由于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和集资的困难，这个公司未能组织起来。不过，他的倡议对后来轮船招商局的开办，显然有所影响。

五、提出选派留学生等内容的条陈和倡导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出。一八六八年一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后，容闳拟了一个条陈，由丁进呈总署，内容是：一、组织一个纯粹华股的轮船公司，承担漕运（此点上已提及）；选派平均十二至十四岁的幼童一百二十人赴美留学，共分四批前往，每年派出三十名，期限十五年；三、开采矿产并筑铁路连接产区和口岸；四、禁止任何宗教团体或宗派的传教士干涉有关其教徒的各种民事或刑事案子的词讼。^②据容闳自己说，条陈的重点是留学生一事。这是他第一次将怀于胸中十余年的计划向清政府提出，但当时未能被批准。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头目先后去天津处理。容闳也被调充译员，他抓住机会通过了运动曾、李等向总署提出留学生计划，是年冬经清政府正式批准。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每年派出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共一百二十名，学习期限十五年，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也是中国直接向西方学习的开端。容闳自认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事业。

六、在故乡办学。容闳在为派遣留学生一事奔走时，又在故乡南屏乡宣传办学。他一面劝大家将各祠堂供奉费用移作办学，一面又从事募捐，自己还带头捐银一千两，共筹得6291两，于一八七三

^{①②}容自传，第171—175页。据《北华捷报》1869年8月26日记载，容闳这次提出的留学生人数不少于两百人，留学地点为美国与欧洲，待考。

年正式建成“容氏甄贤学校”（现为南屏乡小学）。①

七、购买枪炮。一八七三年春，容闳为购买美制新式武器格林炮专程返国，经李鸿章同意，订购了约十万美元的五十尊炮。一八八七年秋，容闳捐献13,133元英洋加上叶源浚、容增祥各捐1,500元。共计16,133元英洋，购买了一批美制枪炮弹药。②这些活动体现了容闳非常注重引进外国的先进武器，以加强国防力量。

八、办报。一八七四年六月十六日，由容闳发起在上海创办了《汇报》。该报创刊后曾改名两次，至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四日停刊，前后共出版一年半。这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新式报刊，曾公开表示宗旨说：“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故有裨于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具有鲜明的爱国反侵略色彩。该报曾反对英国在上海“擅行开筑”铁路，因而遭到英国侵略者的喉舌《字林西报》和《申报》的多次攻击。③

九、保护华工。一八七四年八、九月间，容闳曾奉李鸿章“面谕”“密往秘鲁查访华工情形”。清政府规定凡无约国一律不准招募华工。秘鲁与中国长期无约，但从一八四七年起就非法来华招工，至七十年代，在秘华工已达“十万有余”。一八七三年秘鲁在英美等国支持下，遣使来华订立通商条约，目的之一是想使招工合法化。容闳回国之初曾目睹华工在澳门被骗运出国的惨状，因此，他在与秘鲁钦使的谈判中揭露了秘鲁虐待华工的真相。为了取得真凭实据，容闳在利马调查了华工情形，选录了十四名典型华工的供词和若干呈词，又附上美国驻秘公使及居秘美侨的信函、证词等文件，呈报总理衙门（他自传中还说，附有照相二十四张，拍摄了华工受管被烙的伤痕）。容闳的调查，证据确凿，迫使秘鲁钦使不得不承认华工受迫

①《容氏甄贤学校碑铭》，《容氏谱牒》卷十六。

②《叶源浚容增祥请照原保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下略作《李奏稿》）卷三十一。

③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1—64页。

害的事实。最后换约时，中秘专门就此互换照会，秘鲁保证“实力保护”华工，“不容稍有委曲”。容闳赴秘虽属“密访”但目睹了华工受到非人的待遇，特别是了解到秘鲁扣下很多合同期满的华工并迫使他们继续服役的情况后，便挺身而出，公开“与该官员争论”，使秘鲁“即放出八十人”。①一八七五年底，容闳被任命为驻美、日（西班牙）、秘三国钦差副公使。一八七八年发生了美国同孚洋行代为秘鲁拐运华工案，容闳会同公使陈兰彬照会美国总理外务大臣，对此提出抗议。②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〇年容闳分别就美国排华事件向美国总理外务大臣提出照会。③容闳这些外交活动，完全站在爱国的正义立场上，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

十、赞助郑观应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此局是从一八七六年就开始筹建的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抱着“商战”之志，在一八八〇年再度入局主事后，给时在美国的容闳去函，请他帮助。容闳为郑物色了美国人丹科，丹科在去上海实地考察后，又携带棉花回美试验，鉴定棉花可用，遂在美国选订机器，待试织布样获得成功，便又重去上海规划建厂。

上述十个方面体现了容闳的如下宗旨：一、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武器等；二、注重开展文化教育等启蒙活动，为近代化事业培养各类人材；三、热情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四、坚决反对外国侵略、捍卫民族利益。总的目的是使祖国成为一个足以抵抗外国侵略的资本主义强国。这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基本内容，充满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洋务派的宗旨有原则上的区别。容闳与洋务派可谓是同床而异梦。

不过，既入洋务运动，势必受到洋务派的束缚和利用，如容闳

①以上均据《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秘鲁招工》（原档共七册，存北京图书馆，未刊）。

②③朱士嘉：《美国迫害华工史料》，第49、60页。

购买的枪炮就难保不被用于对农民反抗斗争的镇压。何况，他天真地把实现自己宗旨的几乎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洋务派主持的“自强新政”，这不啻是一种幻想。就是这种幻想却使他不得不对洋务派十分依赖而作出种种妥协，以图能被洋务派所容纳。这也反映了早期维新派因缺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本阶级的力量，只能依附于洋务派而在历史舞台上有所活动的历史现象。

四、容闳与洋务派的关系

容闳的宗旨虽与洋务派不同，但又不能不依附于洋务派而有所作为的特点，充分反映在他与洋务派之间的关系上。这一关系具有既互相依赖利用又互相猜忌矛盾的复杂性，最后终于因为宗旨不同而激化矛盾，导致决裂。

一、关于互相依赖利用方面。

容闳一归国，就有结识达官，以便游说他们采纳其维新方案的想法。在对太平天国失望后，他就把希望大部分寄托于洋务派，多方设法，主动攀上曾国藩的关系。容闳自传中说，他是在一八六三年因曾国藩的多次邀请和催促下才去安庆的，而曾之所以邀请他是由于李善兰、张斯桂等旧友的屡次向曾推荐。其实，他早在一八六二年就去安庆。^①

当时，曾国藩迫切需要熟悉外国情况、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员。因此，容闳一到安庆，就被曾“借重”。这可从曾于一八六三年上半年致郭嵩焘的信中看出：“……容春浦上年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徕渐多，则开厂……此间如华若汀，徐雪村、龚春海辈，内地不乏良工。曷与容君熟商，请其出洋广为罗致。如须贲多金以往，请即

^①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228页。

款之少荃，虽数万金不吝也。其善造洋火铜冒者，尤以多募为要。”^①可见，最早曾国藩只想利用容闳招募洋员，兴办兵工厂。但是，容闳最感兴趣的是办“制器之器”的“机器母厂”的计划，这计划启发了曾国藩，曾在日记中郑重写下了“制器之器”这个新名词，并派容闳出洋购买。^②容闳接受委派的动机除了想使中国有一个初步的基础工业外，还希望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以便来日获得机会，通交曾的支持来实现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容闳与洋务派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互相利用。

互相利用进而为互相依赖。容闳认曾国藩为无与伦比的伟人，视丁日昌为情意投契的至友，把他的维新计划一一向他们条陈，这反映了他对洋务派的依赖。而洋务派方面，对容闳确也十分倚重，大有离他不得的样子。曾国藩致丁日昌函中说：“徐委员（寿）所造轮船，独开生面，容委员（闳）所购机器，与阁下所得虹口铁厂，其事今日不可少之务，其人亦即为中国可造之才，惟须阁下主持调护……”^③李鸿章也非常倚重容闳，认为他“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洋情既熟”，^④因此，无论是重要的外交交涉还是一般的洋务事宜，多次认为容闳去办颇为合适。如一八七四年调查秘鲁华工一事，就认为只能让容闳去办。同年因美国人李仙得助日本侵略台湾，李鸿章要求容闳在美活动，使美国政府制约李仙

①《复郭筠仙》，《曾集·书札》卷一。

②《曾文正公手书记》（下略作《曾日记》）卷十八，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③《复丁雨生都转》，《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64—265页。

④《论派员查办秘鲁华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下略作《李译署函稿》）卷二。

得。①采购外国武器、兵船也曾委托容闳办理。②再如幼童出洋肄业一事，虽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副之，但李鸿章认定此事只能依赖容闳，“若无容丞闳”，陈兰彬“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③当李鸿章“奉谕飭令保荐”出使外洋人材时，李认为该人员“必须博学多识知大体，而尤以通知西洋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但目中所见，实无此项人材，……仅与总署谈过美使宜派容纯甫，为其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嘉秋差强”。④另一处又说容闳“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⑤

二、关于互相猜忌矛盾并导致决裂方面。

洋务派在利用依赖容闳的同时，也对他始终怀有猜忌；容闳虽对洋务派幻想很大，但毕竟因为宗旨不同，并未能对洋务派以诚相见。

容闳在上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时，颇望曾国藩为其开绿灯。可是曾致总署的信，表示了对容闳将筹组的公司为纯粹华商持怀疑态度：“果否是华商集事？保无洋人及买办在内？殊难究悉。若无此辈，未必能仿照外国公司办法。”并要求上海道应室时“留心查访具复”。⑥曾国藩何尝不了解容闳完全具有仿照外国公司办法的能力，不就是他本人推荐了容闳熟悉洋情而遣派出洋购买机器的吗？曾的态度只能说明他反对筹组这个公司，同时对容闳也有猜忌。

-
- ①《论法界击毙华人并止美人助日》，《李译署函稿》卷二。
 - ②《论购枪弹船炮》，《李译署函稿》卷二；《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复区海峰容纯甫》，《李文忠公朋僚函稿》（下略作《李朋僚函稿》）卷十九。
 - ③《条议三事》，《李译署函稿》卷二。
 - ④《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复郭筠仙星使》，《李朋僚函稿》卷十九。
 - ⑤《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李奏稿》卷十九。
 - ⑥《海防档甲·购买船炮》，第876页。

容闳往往被绝对地视作买办。固然，容闳在回国后与上海宝顺洋行及其他洋行有过关系，曾作为洋行的临时雇员去内地调查并采购茶丝，执行过类似买办的职能。但是这种情况为期不长，而他且内心鄙视买办，曾不为高薪所诱而拒绝了宝顺洋行要他当该行驻日本长崎买办的聘请。受雇于洋行的一段时期，倒使他获得了经商的知识，积蓄了一笔财产，得以转而自营商业。一八六三年第二次去安庆前，他已在九江自营商业两年多，拥有至少两万五千美元的财富。^①此后，他仍在与华商合伙，“设行专办货物，往来上海台湾等处”。^②在台湾基隆，他还与美商费勒及哈斯蒂合作经营煤和樟脑生意。^③一八六九年，与徐润、李贻之等五人各出五千两银合开“通源杂粮土号”，经营茶叶。^④可以看出，在六十年代时，容闳已拥有相当资产，是一个经营数种商业的独立资产者了。与此地位相适应，容闳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者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者的利益，出头筹组华商股份轮船公司。

容闳与洋务派的矛盾冲突最典型的事例是幼童出洋肄业局的裁撤。一开始酝酿选派留学生，他就与洋务派有分歧。其留学生计划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学生年幼（10至16岁），二是学习期限长达十五年，容闳的用意很明显，学生年幼，可塑，如长期在美国生活，受到系统的西方教育，必能成为西方型的新一代。可是洋务派经过

①小埃德蒙·H·沃西：《容闳在美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34卷第3期（Eomund H Worthy, Jr,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XI V, No.3.）。

②《汇报》1875年1月9日，转引自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第40页。

③戴维森：《台湾岛》（J.W.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1903），第178页。

④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102页。

再三斟酌定下的规制则强调“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并在礼制上规定“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每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由驻洋之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幼童，望阙行礼，俾娴礼节而昭诚敬”。①总署奕诉等又具奏补充：“令在洋局恭设至圣先师神位，驻洋委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学生一体行礼”。②

容闳无力改变洋务派的定制，但在对留学生的具体管理上，他却坚决抵制了这一套封建东西，而照自己的宗旨和西方教育的方法办理。事实上，这些学生渐渐都美国化了。有些学生甚至“变得如此充满了他们周围的自由精神，以致剪去了辫子”，而且还“有几个学生皈依了基督教”。③按规定应将信教和剪辫的学生立即送回国内，予以惩罚。容闳却对这些学生进行庇护。如一八八〇年底，当容揆已考入哈佛大学时，却被发现入教并割掉了辫子，便立即被取消自费留学生资格，并将被遣送回国。容闳则暗中为之活动，留下一笔必须的费用，使容揆能继续留在美国完成他的学业。留学生被令全部撤回后，容揆仍留在美国。此外还有一个谭耀勋也入了教，因受到容闳的好友特韦契尔的照料，得以继续在耶鲁大学肄业。④

这些势必引起容闳与其他管理留学生事务的洋务派发生矛盾冲突。除容闳为肄业局副局长外，先后担任委员的有陈兰彬、区潆良、容增祥和吴嘉善四人（这一人事安排也说明洋务派对容闳并非

①《应办事宜六条》（曾国藩、李鸿章联衔具奏），《李奏稿》卷十九。

②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61页。

③托马斯·E·拉法格：《第一批一百名中国人》（Thomas E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Pullman, 1942年），第38—39、45—46页。

④拉法格：《第一批一百名中国人》。

完全信任)，他们没有一个不以容闳为非。陈兰彬去美国后一年，即与容闳不和，时相“抵牾”，要求总署内调。区潞良则致函李鸿章，要求“中道撤回”留学生。容增祥也向李鸿章告状：“……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由于容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然。”①吴嘉善一到肄业局，便“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其间李鸿章对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也曾“寓书诚勉，不啻至再至三”。②李又对人说，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③最后下令要容闳“勿固执己见，……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吴嘉善）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④李说得不错，容闳确实不懂封建主义的“大体”。这里容闳与洋务派的主要分歧非常明确地表现为两者的宗旨不同，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容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不仅偏重西学，而且还排斥中学。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兰彬、吴嘉善之流完全是顽固派旧学者，因而根本反对派遣留学生，把容闳与他们的矛盾描绘成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这与事实不符。应当说，他们都是洋务派，特别是陈、吴两人更是道地的洋务派。陈兰彬，字荔秋，广东吴川人。翰林出身，与洋务派要员丁日昌交好，并由丁推荐，于同治七年正式入曾国藩幕。⑤陈深得曾的信任，曾给陈的考语是：“该员实心孤诣，智深

①《光绪六年四月二日复陈荔秋星使》，《李朋僚函稿》卷二十二。

②《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李译署函稿》卷十二。

③《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复郭筠仙星使》，《李朋僚函稿》卷十九。

④《光绪六年四月二日复陈荔秋星使》，《李朋僚函稿》卷二十二。

⑤《曾日记》，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八日。

勇沉，历练既久，敛抑才气，而精悍坚卓，不避险艰，实有任重致远之志”；曾每当与其议及“操练轮船”“肄业西洋”等洋务要事，陈“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有成”。①李鸿章也说“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材使气；与讨论时事皆洞烛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②陈虽中学较深，但也喜谈洋务，与王韬长期交往即是一证。③被曾、李如此倚为心腹、主持洋务大事的人，不是洋务派，这是不可思议的。吴嘉善，字子登，江西南丰人，亦翰林出身。早在同治元年，曾国藩开始延纳洋务人材时，吴即去过安庆并受到重视，曾专请其中饭。④吴广泛地与有名的洋务人材交往，如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亦与王韬交厚。⑤《南丰县志》记载：“……咸丰初年诏求交涉才，同乡枢臣某以嘉善熟悉洋务列荐，诏书促赴都，音善力请当道，陈情有母在不就也。……尤好习外洋文字，潜心玩索，虽不通其语言，然竟能翻译。其于化学、算术、机械皆得之文字中，……中国之研究科学者，咸以嘉善为鼻祖……早于风气未开之先，知中国非讲求科学未足救亡……著有算术廿一种（《白芙堂算术丛书》，长沙，1874——引者）、《翻译小补》。梓行于世。”⑥吴被派为肄业局委员，事实上是出于容闳的推荐，为陈兰彬所“奏调”。⑦

李鸿章、陈兰彬、吴嘉善等人与容闳的矛盾纯属洋务派与早期

①《调陈兰彬江南差遣片》，《曾集·奏稿》卷三十。

②《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李奏稿》卷十九。

③王韬：《上陈荔秋星使》、《上丰顺丁中丞》，《弢园尺牍》，第130—131、178页。

④《曾日记》，同治元年八月廿一日。

⑤王韬：《与吴子登太史》，《弢园尺牍》，第76—78页。

⑥《南丰县志·儒林》卷十八（民国九年重修、民国十三年版）。

⑦《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李译署函稿》卷十二。

维新派的矛盾，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对立、封建主义落后性与资本主义先进性（虽然它本身也有很大局限）的冲突。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曾纪泽的一段话实在道出了洋务派裁撤出洋肄业局的根本原因：“昔年陈荔秋、容纯甫率幼童出洋，纪泽侍先太傅前，陈说利弊。……当时言：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中国无大益也。”^①他担心这些没有读过圣贤书的留学生会叛离封建主义，而落得个为他人作嫁衣裳。洋务派头子李鸿章也是出于这种担忧，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才同意了陈兰彬、吴嘉善的裁撤方案，一八八一年，清政府决定提前撤回全部留学生。容闳便愤而退出洋务运动，与洋务派最终决裂。

五、结论

容闳在洋务运动前和洋务运动中的主要活动、主张以及他与洋务派的关系，都说明了他是早期维新派的面目参与洋务运动的。这也说明：中国近代维新思想除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发展而来或从洋务思想分化而出外，还直接来源于外国资产阶级思想，而且后者比前两者出现得更早，容闳即是一例。

洋务运动未能使中国富强，未能改变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趋势，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毕竟也给历史留下一些积极成果，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最根本的是在其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的经济，如近代军、民用企业和铁路、轮船交通运输业；出现了新的阶级，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了近代科技队伍和新的社会思潮，如洋务思想和维新思想。洋务运动虽由洋务派主持，但主要起进步作用的则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即早期维新派。从容

^①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9页。

閔的具体情况来看，可列出如下两个积极方面：

一、容閔的活动和主张对洋务派有积极的影响，对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如一八六三年容閔提出的访求“制器之器”的主张，经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实施，曾一度成为洋务派所热衷的口号。从而开创了引进机器工业的风气，为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及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包括维新和革命）的兴起，开始奠定物质基础。再如曾国藩在容閔提出附设一所机械学校于江南制造局的建议后，便在一八六八年的奏折中提出：“……另立学馆，以司翻译，……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①江南制造局翻译了当时一批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西书，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新的科技力量。第一批留美学生的遣派，也是在容閔倡导下，由洋务派主持实现的。此后，留学生源源出洋，至1906年，仅日本留学生就已达一万三千余人，形成留学热潮，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革命运动都有直接的重大影响。留学生运动不仅造就了一批科技、外交、文化人材，它还促进了社会风尚的进步，容閔倡导的第一批留学生，实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新起点。

二、容閔的主张成为后来维新运动的思想先导之一。前述容閔向太平天国提出的七策和他在洋务运动时期活动和主张的四点宗旨，整个地形成了此时期他的维新主张。这些主张是当时先进思想的一部分。从思想史发展的脉络看，容閔的维新主张便具有后来维新运动思想先导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进而投身于后来的变法维新运动，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逐渐转变为革命派。^②

①《新造轮船折》，《曾集·奏稿》卷三十三。

②关于容閔洋务运动以后的活动和主张，参见拙文《关于容閔的晚年》，载《史学月刊》1981年第三期。